

“中國文學發展史”批判

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教研組編



“中國文學發展史”批判

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教研組編

中 華 書 局

《中国文学發展史》批判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教研組編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龍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1/32·9 13/16 印張·211,000 字

1958 年 12 月第 1 版

1959 年 3 月上海第 2 次印刷

印數：3,001—15,000 定價：(6)0.95 元

統一書號：10018.126 53.12.匯理

前 言

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是当前教育革命的重要环节，是學術領域內的興無滅資的斗争。現在这一斗争已在我系深入开展。

过去，在我系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資產階級學術观点。不少教師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自覺与不自覺地以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封建正統观点以及資產階級庸俗进化論观点等，来解釋文学發展的历史，抹杀文学領域內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他們抽掉了馬列主义的階級論，以反動的資產階級人性論来評價文学史上的作家和作品；他們反对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統一、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批評标准，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批評标准以及資產階級庸俗的艺术趣味来衡量文学史上的作家和作品的所謂艺术成就，严重地歪曲了我国文学史的真实面貌，減弱了真正的人民文学的光輝。所有这些，都在我系同学和社会上的广大讀者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使他們在閱讀和研究古典文学时，分不清精华和糟粕，接受了古典文学中的消極和錯誤思想的毒害，妨碍了青年人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成長。例如，在不少教師的資產階級學術观点的指导和熏染下，我系曾有一部分同学鑽进了古書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想走白專路”，对社会主义事业不感兴趣。有些甚至覺得人生毫无意义，精神空虛，想做和尚和隱士；或則將自己的安慰寄托在李清照、李后主的感傷詩詞中。为了貫徹党的教育方針，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覺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深入教育革命，粉碎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体系，清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恶劣影

响,建立以毛澤东思想为指导的学术思想体系,加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党的领导下,从“双反运动”开始,我們就对資產階級学术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

“双反运动”中,我系师生贴出了五万張大字报,揭露了不少教师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观点。在教学整改运动和批判“厚古薄今”問題的大辯論中,資產階級学术观点受到了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目前,在教学革命获得初步成就的基础上,在进行全面建設的同时,我們又繼續掀起了群众性的資產階級学术思想批判运动;現在这个运动还在深入發展中。这个运动得到了我系广大群众特别是同学和青年教师的热烈拥护。运动中,同学和青年教师打破了对旧專家的迷信,解放了思想,在党的领导下,以毛澤东文艺思想武装自己,投入斗争。他們首先对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發展史》一書中所表現的严重的資產階級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写出了許多批判論文。由于在运动中經过了学习,經过了辯論,不少教师也認識到学术思想批判运动是一場深入的自我革命运动,所以像刘大杰先生等,也写了自我批判的文章。为了扩大这个运动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推动在全国範圍內的学术批判运动,为大家在进一步討論和研究問題时提供参考,我們收集了有关批判这一部書的一部分論文在这里發表。这些文章中有許多正确的看法(我們以为是主要的),但也可能有片面的地方,希望大家討論和批評。

因为本書所收輯的主要是批判《中国文学發展史》中的錯誤观点的論文,所以定名为《中国文学發展史批判》;但也收輯了几篇批判刘大杰先生在別的著作中的錯誤观点的文章以及另外一些教师的自我批判的文章。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教研組 1958年12月10日

目 录

前 言

我們的看法——評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發展史》

中文系学生 邱明正 陆士清 徐佩琚1

錯誤在哪里?——評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發展史》

中文系三年級 陈祖堃 馬聖貴 范民声16

批判刘大杰先生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發展观

吳大遠 顧易生 章培恒27

胡适文学史观的再現

中文系三年級 李振杰 盛鍾健42

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規律不容抹煞

中文系四年級六人小組52

階級論还是人性論?——刘大杰先生資產階級文学史观批判

中文系四年級六人小組64

批判刘大杰先生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观点

中文系四年級六人小組71

批判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發展史》中的唯美主义观点

中文系三年級 榮正一86

《中国文学發展史》为什么要謳歌消極浪漫主义?

王運熙98

批判刘大杰先生对待民間文学的錯誤观点

中文系三年級 王繼權 徐佩琚109

关于《詩經》發展的一个严重錯誤的公式

中文系四年級先秦文學小組118

刘大杰先生拜倒在庄子脚下

中文系四年級先秦文學小組123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什么？

——評《中国文学發展史》汉賦部分的錯誤观点

中文系四年級兩漢文學小組127

《中国文学發展史》上古至兩汉部分批判

中文系四年級先秦文學小組136

“建安風骨”是怎样形成的？

中文系三年級 范民聲 馬聖貴 陳祖堃 李寶均143

批判刘大杰先生在对陶淵明评价上的資產階級观点

中文系三年級 姚國華 盛鍾健 王 崧149

批判刘大杰先生对唐詩评价中的形式主义观点

徐 鵬156

批判刘大杰先生评价王維的資產階級观点

中文系四年級唐代文學小組164

評刘大杰先生在晚唐文学中所表現的資產階級观点

中文系四年級唐代文學小組171

与刘大杰先生商榷李后主及其詞的創作問題

中文系四年級唐宋詞小組179

刘大杰先生笔下的苏轼

中文系四年級唐宋詞小組188

批判刘大杰先生在李清照评价中的資產階級观点

中文系四年級唐宋詞小組196

从元杂劇的發展談刘大杰先生否定阶级斗争对文学的作用

中文系四年級元曲小組202

刘大杰先生貶低了关汉卿和他的作品	
中文系三年級 徐佩珺 孙 杰 姜兴文 王祖猷	206
根本分歧在哪里?——評刘大杰先生对《金瓶梅》的評價	
中文系四年級明清文学小組	217
批判《中国文学發展史》明清小說部分	
潘旭瀾	225
批判刘大杰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观点	
中文系四年級 徐俊西	238
刘大杰先生在研究《紅樓夢》中的几点錯誤	
李 平	245
怎样評價金聖嘆	
中文系四年級明清文学小組	259
刘大杰先生对《老殘遊記》的分析是胡适思想的翻版	
中文系四年級 邱明正	265
一点体会	
中文系四年級 蔣守謙	271
批判《中国文学發展史》中的資產階級学术思想	
刘大杰	275
批判我的厚古薄今資產階級学术思想	
王运熙	284
通过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批判我的資產階級学术思想	
王欣夫	293
后 記	298

我們的看法

——評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

中文系學生 邱明正 陸士清 徐佩碧

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一書的資產階級觀點是非常嚴重的。它曾經在讀者中產生了不良的影響，現在劉先生自己也認識到這個錯誤的嚴重性，並且作了自我檢討。這種態度是值得我們歡迎的。經過幾個月來的群眾性的分析批判，我們覺得歸納起來，劉大杰先生在學術思想上的錯誤基本上有三個方面，現在就劉先生的錯誤再談談我們的看法。

一

歷史從來就是人民的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高爾基說道：“人民不但是創造一切物質財富的力量，同時也是創造精神財富的唯一無窮的泉源，他在創作的時間、美和天才上都是第一流的哲學家 and 詩人，這樣的詩人写出了人間的一切偉大的詩篇和悲劇，也写出了其中最偉大的一篇——世界文化史。”（《個性的毀滅》）推動歷史前進的是人民，推動文學前進的也是人民。但是一切資產階級的專家都是否認這一點的，劉大杰先生也不例外。

在《中国文学發展史》(下称《發展史》)中,刘先生把文学看作是主觀的产物,把个人主觀意圖看作是文学發展的主要动力。他在这本書的《原序》中写道:“……文学史者要集中力量于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介紹与分析,因为那些作家与作品正是每一个时代文学精神的象征。”刘先生就是从这一錯誤的理論出發,来論述我国历史上的文学現象的。因此,他誇大了个别文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誇大了所謂爱好文艺的皇帝貴族对文学發展的作用,搬用了反动文人胡适的观点。在談到唐代文学的發展时,胡适說:“太宗是个很爱文学的皇帝,他的媳妇武后也是一个提倡文学的君主,他們給唐朝文学种下了很丰厚的种子。到了明皇开元(713—741)天宝(742—755)之世,唐初下的种子都生根發芽,开花結果了。”(《白話文学史》上卷 214 頁)胡适把一种新文学的产生也看作是某些天才文人的“决心”和“意志”的产物。他說:“九世紀初期——元和長庆的时代——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几个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动,都下了决心要創造一种新文学。”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的《导言》里厚顏无耻地說:“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适之陈独秀一般人’,至少也得迟出現二三十年。这是我們可以自信的。”而刘先生則說道:“武宣时代,君主貴族的提倡辞賦,于是辞賦盛極一时。”(《發展史》上卷 249 頁)汉賦的盛衰既然如此,唐詩、宋詞的兴起当然也少不了“君主的提倡”。很明显,刘先生沿用了胡适的邏輯,把个别文人和統治階級看作是推动文学前进的基本动力。

我們不一般地否定文人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但真正推动文学前进的是人民、是人民的創作。这一点已为我国民間文学的事实雄辯地証明了。《詩經》中的国風、汉代的乐府、早期的宋

詞、元曲和話本，都是從民間來的。無論在形式主義、感傷主義盛極一時或在這些東西為現實主義文學潮流所吞沒的時候，它們總是遵循着自己固有的道路，發展着和不斷地豐富着，並且左右着文壇。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億萬首的大躍進民歌，不是沖進詩壇，改變了一代詩風嗎？

當然，歷史上的文人對於文學發展也起着這樣或那樣的作用。文人有两种：有像屈原、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那樣基本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文人，也有像李后主、周邦彥那樣的統治者和統治者的幫辦。這些文人，由於他們對人民的態度不同，站在不同的歷史潮流里，對文學起着不同的作用。前者是推着文學前進，後者是拉着文學後退。因此，認為歷史上所有文人都能推動文學的發展，是極其錯誤的。

進步的文人能夠推動文學的發展，這也是事實。但是他們的真正作用還是在於總結、提高和豐富民間文學，使民間文學更加完善。而這只有當那些進步作家在與人民的接觸中，認識到民間文學的偉大，以它為師，從中吸取養料，以它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時，他們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不能設想離開了人民的生活，沒有了民間文學的熏陶，屈原、李白能寫出有高度思想意義和巨大的藝術感染力的詩辭來。由此可見，個別文人的作用是微小的，他不可能超過人民群眾的作用。任何天才一旦離開了人民，不管他個人的力量有多大，都會變得暗淡無光。

我們承認某些皇帝提倡文學是事實。文學是經濟基礎的形象反映，在階級社會里，它是階級鬥爭的有力武器。無論是剝削階級或被剝削階級都想占有它，用它來動員和組織自己的力量，打擊對方。歷史上的帝王都是統治階級的代表，為了達到鞏固統治，滿足自己窮奢極侈的荒淫生活的目的，他們自然也提倡文

学,把它作为緩和阶级矛盾的手段和娱乐的工具。但是,这种提倡与文学發展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从表面看来,他們的提倡也能促使某种文学样式的完善。但由于他們是从統治阶级的要求出發的,所以实际上他們愈提倡,文学就愈会失去生命,把活文学变成僵化了的死文学,替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开辟道路,使反現實主义的文学猖獗一时。汉初的辞賦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现实生活,但当它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时,就变成了澈头澈尾的形式主义文学。这就是最有力的証明。

既然刘先生認為文人的作用和帝王的提倡是文学發展的動力,抹杀了人民在文学中的偉大造詣,那末,在評價历史文学現象时,就必然提高文人文学、貶低民間文学。刘先生对于文人特别是那些消極頹廢文人的作品津津乐道,把周頌說成是国風的源,甚至說是后代戏剧之源,把汉賦說成是汉代文学的主流,而把当时真正的主流——汉乐府貶为末流,并对各个时期的民間文学采取不屑一顧的态度。这些正是蔑視民間文学的表現。在这一点上,刘先生暴露了自己的封建正統观点。

刘先生的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更集中地表现在他从法国資產阶级文学史家朗宋和买办文人胡适那兒承接过来的資產阶级庸俗进化論上。他在《發展史》的《原序》中写道:“在社会物質生活日在进化的途中,精神文化自然也是取着同一的步調。生活在二十世紀科学世界的人群,他脑中决沒有卜辞时代的巫术观点。因此,文学的發展,必然也是进化的而不是停滯的了。文学史者的任务,就在叙述这种进化的过程与實質,形式的演变以及作品中所表現的思想与感情。”从資產阶级庸俗进化論观点出發,刘先生把弗里契关于文学發展分为巫术的、宗教的、个人的、社会的四个阶段的錯誤公式,竟毫无保留地搬到自己的書里

来，替《詩經》的發展也編了一套公式。那就是：为宗教服务的頌
进化到宮廷詩歌、大小雅中的宴会詩、田猎詩和民族英雄叙事詩，
再进化到表現神权衰落、人性觉醒和表現社会生活面貌的变風
变雅。在这里，刘先生給我們两个結論：《詩經》开始是人的文学
与神的文学的对立，文学进入了社会阶段，对立就不存在了；变
風变雅的源是雅頌，雅頌进化的結果是变風变雅。这种結論是
荒唐的。文学从来就是社会的。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文学，
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人”的或“神”的文学。在阶级社会里，
有着两个对立的阶级和对立的文学。变風变雅和頌及部分雅正
是两个对立阶级的产物，它們反映了对立阶级的思想感情，代表
了两个阶级的利益。刘先生却硬把它們拉到一条綫上来，說成
是同一事物进化的两个阶段，而否認了它們的根本区别。

庸俗进化論者，他們不承認有阶级的社会，有什么阶级斗
爭，因此他們也就不承認阶级斗争对文学的制約和影响。这就
必然导致抹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因为这是阶级斗
爭在文学領域中的反映）。刘大杰先生正是这样。

现实主义文学总是忠实地反映现实，揭示生活真实的。而
反现实主义文学总是歪曲现实生活，对客观世界作不真实的描
写。这两种創作傾向是两个对立阶级对生活、对文学不同态度的
表現，也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觀的产物。在我国，自《詩經》以来直
到今天，文学中始終存在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现
实主义文学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始終是主流，反现实主义文学不
断被克服、被摺弃，它始終是逆流。文学就是在这斗争中成長發
展的。所以說文学發展史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
史，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在中国文
学史上，有变風变雅和雅頌的斗争，汉代民間詩歌（乐府）与宮廷

文学(賦)的斗争,南北朝民歌与当时宫体诗的斗争,以陈子昂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和齐梁遗风的斗争,岑高诗派与王孟诗派的斗争,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刘长卿为代表的隐逸派和韩愈为代表的苦吟派的斗争,晚唐皮日休等人与李商隐等唯美主义者的斗争,以及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与花间派、西昆体、格律诗派、江西诗派、同光体等等的斗争:这一系列的错综复杂的斗争贯穿在整个文学史中。斗争的结果,都是现实主义文学取得了胜利,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这种斗争是表现在多方面的。它表现在历来的各种文艺理论上,也表现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在创作方法和创作流派中,也表现在同一作家和同一部作品中。每当历史上封建统治比较稳固的时候,由于统治阶级加强了对文学的统治和大批文人的趋炎附势、做统治阶级的帮闲,文壇上往往烏烟瘴气,形式主义风靡一时,文学走向僵化的道路。但到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社会大动荡的时代,由于文人得到和人民接触的机会,有的甚至和人民受到同样的遭遇,这样就使他们的感情和人民接近,写出了一些具有不同程度人民性的作品来,反映人民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在民间文学里就会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文学出现。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但是刘先生却离开了这个规律去解说文学现象。因而对文学的主流和次流,两种文学同时存在,文学的继承关系等问题上做了一系列的错误的理解。

庸俗进化论者无视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规律,抛弃了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学说,看不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进步对文学发展的作用。于是,他们把文学发展看做是新陈代谢,新旧交替,旧的衰亡、新的产生、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自然演变,以生物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规律——适应者存、不适应者亡等

錯誤观点来解釋文学上的現象。胡适在《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一文里說：“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唐人不可作商周之詩，宋人不可作相如、子云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又說：“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記載，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王国維在《人間詞話》里說：“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杰之士，再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脫。一切文体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于此。”刘先生对胡、王两說是傾倒的，他說：“詩歌發展到了唐宋，無論古体律絕、長篇短制都达到了最成熟的阶段，后代虽有不少人从事制作，已难显出什么惊人的獨創性”，所以詞和曲就产生了。后来“各种文体，如詩、文、詞、曲、杂剧、傳奇种种的特色，在各时代都已發揮殆尽。到了清朝，全变成了旧的形式，任你是大才力的作家，既不能够向新文体新形式方面謀發展，想在那旧的形体中，灌輸新生命，恢复艺术的青春力量，实在是很难的。”“所以小說这一部門，在清代表現了优美的成就，而占了清代文学史上的主要地位。”（下卷 268 頁）庸俗进化論者在論述文学样式（他們根本沒有談內容）的进化时，好像有些道理，但是經不起一駁的。自《詩經》以来，的确有不少文体由兴盛到衰落，而新的文体又在不断产生。这种發展变化应从社会条件上去找原因。社会生产力是不断發展变化的，社会关系也就越来越复杂，人的精神生活，人的思維能力也就随着变化。在內容上要求文学不断反映新的现实，在形式上也就要求它不断完善，使之滿足正确地表現內容的要求。小說的产生，并不是因为詩文、詞曲、傳奇、杂剧已經衰老，而是因为这些形式已不能滿足于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們复杂的思維过程的需要，因此小說才逐漸形成。它

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二載，也不是十年八年，而是經過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發展过程，最后才發展成像明、清时代的那样完整。同时，在小說兴盛的时候，其他文学样式也并没有中止。事实上，清代曾出現不少优秀的詩詞和散文等等。到今天，古典詩詞也还保存着不朽的生命，毛主席的詩詞就是最好的說明。因此說这些文学样式的特色“都已發揮殆尽”是毫无根据的。

以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无原則的抬高文人和統治者在文学史中的作用，貶低人民群众的貢獻；以資產階級的庸俗进化論观点来解釋文学史的發展，这是刘先生第一个根本性的錯誤。

二

既然刘先生否認文学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否認階級斗争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約，否認階級的文学，那么刘先生在評價作家和作品时，就必然排斥階級性，代之以人性論。

前面已經說過，文学是階級斗争的武器，虽然在社会分化为階級以前就有了文学，但当階級出現以后，文学就立刻成为階級的文学。这是客觀事实，不是任何人的主觀臆造。历史上一切統治階級都意識到这一点，并且積極培植御用文人，夺取文学的领导权，使文学为自己服务。但是資產階級为了淆乱視听，偏偏替文学披上一件“超階級”的外套，把文学說成是凌駕于階級之上的怪物。在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發展史》一書里，我們很少看到階級这个字眼。刘先生在介紹和分析作家的时候，几乎都沒有提出他們的特定的階級地位，使讀者无从知道这些作家站的是什么立場、反映的是什么階級的思想意識。講到他們的思想基础的时候，总是抬出儒、道、佛三家来，例如說陶淵明“有儒、道、佛三家的精华而去其落后的部分”，“陶淵明之所以为陶淵

明，就在他独有的人格、时代精神以及各家思想的精华，因而形成那种特殊的典型。”（上卷 237 頁）再如苏东坡，說“他的思想很复杂，他有儒家的底子，积极的人生态度，他又爱老庄，爱陶淵明，并且也欢喜佛經道藏，常与和尚道士們交游，風流儒雅，飲酒酣歌。”（中卷 307 頁）这里，刘先生以三家代替了阶级分析。这三家虽然有着一定的阶级基础，但畢竟不能和某阶级的内涵等同起来。所以說，刘先生实际上舍去了作家的阶级地位，取消了因阶级地位而产生的不同的世界观，也就否認了世界观对于创作的指导作用。文学作品的倾向性是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的，既然否認了世界观，那末作品的倾向性就不存在了。

刘先生既然不談作家的阶级地位，当然就看不到古典作家的阶级局限性。在文学史上，出身于上層阶级的作家，他們除了受到历史的局限以外，还受着阶级的局限；由于他們沒有或沒有完全跳出原阶级的樊籠，所以就大大削弱了他們作品中的人民性因素。因此我們分析古典作家除了用历史的观点以外，还必須要有阶级观点。但是刘先生却把古典作家身上反映出来的消极因素一律归罪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而寬容了他們的落后和反动的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观所造成的反现实主义因素。譬如講阮籍的消沉遁世的人生观是因为社会黑暗、統治阶级荒淫暴虐、草菅人命，所以“士处当世，对于现实的希望完全消灭，不得不由积极的救世的人生观，变为消极的避世的人生观。”（上卷 260 頁）正因为如此，所以魏晉南北朝的作家們追求清靜无为，飄然物外的人生态度，都得到刘先生的寬恕、甚至力加頌揚，認為他們“清高”、“聖潔”。在这里，刘先生掩飾了文学史中的反现实主义因素，也同样抹煞了世界观对文学创作的決定作用。

刘先生抛弃了阶级观点，必然滚进“人性論”的泥潭，玩弄抽